第六个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刑警刘志刚一直在找一朵玫瑰花。

作为12起命案中最关键的“血色”，这朵“花”已经消失了14年。

2005-2006年不到3个月内，一个6人团伙先后抢劫并杀害两省三市12名出租车司机，包括11男1女，抢得钱财4000余元。这是1949年以来，“针对出租车司机群体最大的系列杀人案件”。

最后一起案件发生次日，该系列案告破，团伙中3人伏法，2名未成年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仍有一人尚未归案。同案犯的交代分别指向这个名叫杨通的人，称其是第一个决定去抢劫、杀人的主谋。此后，寻找消失的主犯杨通，成了黑龙江警方每年的“必考大题”。

在警方发出的通缉令中，那个22岁的青年相貌清秀，特征包括“右上臂文有一朵红玫瑰”。

12月4日傍晚，肇源县街头的出租车正在等待乘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被害人

何巧莲（化名）记得，2006年2月26日，丈夫刘仲春（化名）刚吃完午饭就急着出门拉活儿。

他开的那辆红色夏利出租车还有7天就要报废。那是夫妻俩从银行贷款买的，虽然“老是坏”，但依然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

刘仲春和妻子盘算，跑完这几天就不干了，以后做点买卖。眼看外甥女要结婚，他想跑个份子钱，如果活儿多，还能跑个车票钱，回吉林老家看看父母。

那天下午出门前，这个一向顾家的男人把两件衣服泡进盆里，让妻子等他回来洗。

第二天，43岁的刘仲春在距离大庆市28公里外的一处排水沟被发现，身中56刀。何巧莲的姐姐说，为了能让刀顺利刺入腹部，凶手行掀开了刘仲春的上身棉衣。

这是自2005年12月起，相继发生在黑龙江省肇源县、大庆市、哈尔滨市、肇州县的第七起出租车司机遇害案。公安机关通过分析作案手段、对比刀口、勘验现场痕迹发现，这些案子是同一伙人所为。

遇害司机都身中数十刀，一名司机遇害后，身上仅有的24元钱被抢走；两名司机分别遇害，被抛至同一处坟坑内；有司机试图逃跑，遭凶手扑倒后残杀……刘仲春是这些被害人中被捅刀数最多的一个。

在杀害刘仲春前，凶手一伙人发生内讧，17岁的成员江铭（化名）在参与两次劫杀后，趁其他成员在洗浴中心时，偷走了两部抢来的手机和200余元钱，然后逃离。

随后，其他人无钱支付洗浴费用，便“抵押”了一人，其余3人出门劫杀了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司机，就是刘仲春。

2天后，江铭启用抢来的手机，大庆公安锁定信号将其抓获。

刘志刚、余涛、孙彦辉等当时在不同岗位的警察都记得，那几天，大庆市天气严寒，全市所有公安机关人员几乎全部上街参与抓捕，警车在城里各处鸣闪警灯巡查。

3天后，杀人团伙中剩余4人被抓。5人中3人被判处死刑，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14年后，何巧莲对记者称，自己原谅了当年的两个未年成人，但噩梦并没有彻底放过她。

她常常梦到丈夫回来洗那两件衣服，她哭着问“你在哪”“你怎么不回家”，但梦中的丈夫总是不看她一眼。

在刘仲春永远回不去的家，已看不到他生活的痕迹。何巧莲搬离旧址，独自一人抚养女儿长大。这个50岁的女人床头摆着许多眼药水空瓶，她眼睛不好，手机里的字体调至特大号才能看清。她曾听一位医生说，“眼泪温度高，总哭就把眼底烫伤了”。

当年的案件材料、旧报纸被她夹在家庭相册中。她和女儿很少谈论刘仲春，更不会提到那消失的第六个人。她曾在诉讼材料中看见过杨通的名字，她恨这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甚至想去他的家乡查一查，“为什么他会想去杀人”。

追捕者

刘志刚把杨通的照片和通缉令存在电脑、手机里，还打印出一份放在手边，隔三差五拿出盯着看。

2006年杨通潜逃时，刘志刚33岁，是大庆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第八大队的一名刑警，主要负责追捕逃犯。

最接近的一次是2006年3月，刘志刚得知杨通在哈尔滨，但赶去时人已逃走。为期14年的追捕开始了，用刘志刚同事韩彦春的话说，这个世界上，除了杨通爸妈，“我们是最惦记他的人”。

多年来，警方接到许多有关杨通的举报线索，有说他砸了卖鸡蛋小贩摊位的，有说他买了炸药和枪要去干大事的，有说他想从云南偷渡出国的，还有人发帖自称杨通打听“自首宽大”政策的。这些线索最终全部“查否”。

2010年之后，杨通的身份证信息在多地被注册滴滴、支付宝、百度外卖、ofo共享单车、YY语音账号以及完美世界、街头篮球、九阴真经等游戏账号，还被注册了数十个手机号。警方推测，公安部A级通缉令有时出现在网吧电脑的开机画面上，身份信息易被他人“借用”。

2012年，刘志刚接任追逃大队队长。他的上级、时任大庆公安局刑侦支队长王天华叮嘱，“一年哪怕啥也不干，能把杨通抓回来就行”。

14年来，追捕杨通的专案组换了5批、刑警换了三茬。刘志刚和同事几乎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全国各地追逃。得知杨通可能回家过年，他们会去他老家隔壁潜伏，或躲在面包车里盯梢。

刘志刚已经47岁了，有了皱纹和白发。刑侦支队不断有80后、90后刑警加入。新人报到时，都会听“老警察”讲述一遍那个消失的第六个人以及当年的系列杀人案。

80后王帅从外省调来，见过“大世面”，但听到当年惨烈的凶案，还是说“闻所未闻”。后来，他主动加入专案组。

“每逢季度、年度考核或是专项行动，上级必提起杨通。”大庆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罗红卫说，有时“被问得脸都红”，而且，“12个人横死，主犯找不到，家属不得安宁，对于刑侦警察来说，这是巨大的耻辱。”

肇源县公安局的新办公楼在松花江岸边，阳光下的冰河格外明亮。但对刑警来说，更显眼的是大门左前方、第十个被害人被抛尸处。案发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地。

杨通的名字以及他那张白净、有点秀气的面孔，一直在公安机关庞大的数据系统里流动，寻找与之相关的数据。

不断迭代的技术像愈加细密的网筛，网孔越来越小、精度越来越高。

2016年，在一次全国系统的筛查过后，警方确定杨通没有激活身份信息，推断他在冒用他人身份或使用假身份生活。

2020年8月，河南省三门峡公安利用数据库匹配到一名因盗窃入狱者，与杨通极为相像。

行凶者

没人说得清，2005年冬天，刚过22岁生日的杨通，为什么突然带着两个发小去抢劫。

他出生于肇州县二井子镇，父母健在，家中有一个妹妹，6岁时全家搬到相邻的肇源县卖糖块。他小学毕业，18岁外出打工，在哈尔滨、双鸭山卖过海鲜，给餐厅切过菜，谈过恋爱。

据同案犯王东成和范明坤供述，20岁的王东成是杨通的邻居，在大庆市打工，2005年11月底的一天，杨通找到王东成，称要带他干一个“挣钱多”的活儿。随后二人回到肇源县，杨通向王东成介绍了小学同学、21岁的范明坤。

三人最初计划要抢食杂店，走到门口看到店里人多，便放弃了。

改抢出租车的原因是，不用专门寻找作案目标，满大街都是；有现成的车辆用来逃跑；更重要的是出租车肯定有现金。

“即使刚出门一个人没拉，司机肯定带着零钱吧，零钱至少能破开一张100元的。”范明坤供述道。第一个被选中的司机“看起来是个老头儿”“说话温和，没劲儿”。

第一次，杨通没有动手。一位办案民警说，杨通“鬼道”（脑子灵活），主要承担军师、财务的角色。他负责与司机聊天，观察周边环境，伺机示意停车。作案后，他坚决主张卖掉或销毁被害人手机，抢到的钱也由他分配。

2005年12月14日，3人回到大庆市萨尔图区，蒙语意为“月亮升起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抢劫了一辆黄色奥拓出租车。这次，“杨通拿刀扎司机后背”。

在杀害第四个司机时，杨通突然“怂了”。

2005年12月18日接近午夜时，杨通三人在大庆市劫了一辆红色捷达出租车，杨通和王东成拽着被反绑的司机走向一处坟堆。不一会儿，杨通自己回来了，说“我干不了”，没说原因。范明坤也没问，拿上刀走向坟堆。此时，王东成已将司机抵在树上，范明坤一刀扎在司机前胸。司机挣脱后跑了两步，大骂他们“不讲究”；“拿完钱还要杀人”，被范明坤扑倒在地，用刀猛刺。

杨通认为，“那两人疯了”。他告诉警方，自己控制不了王、范二人，如何处理手机，他们也发生了分歧。

杨通离开了。两个月多后，王东成、范明坤又找到范明坤的哥哥范明辉、两个17岁的少年江铭和孙晓（化名）入伙。

新的团伙更加疯狂，2006年2月25日-28日，他们在4天之内作案8起。

当地出租车司机开始警觉，夜班不拉多名男子。范明辉的左腿曾因触电高位截肢，拄一根拐杖。从2月25日起，他独自一人站在街边打车，随后以“接朋友”的名义把其他4人接上。车行至偏僻处，范明辉会说“腿麻了需要换换位置”，让司机停车。

“我这个形象，往路边一站，没有出租车不停的。”范明辉在接受审讯时说。

驾驶哈飞路宝出租车的司机是12名遇害人中唯一的女性。2月25日下午，她驾车在肇州县遇到这5个男子，主动鸣笛询问他们要不要打车。

“本来没想劫她，但这个车型以前没见过，她又主动招我们，就上车了。”事后，王东成供述说。

在江铭供出杨通是主谋后，大庆公安前往二井子镇抓人。据警方事后调查，杨通家所在村村长说了一句“你家杨通出啥事了，怎么市局都来了？”杨通父亲听闻立即找到儿子，得知他“杀人了”，便给他1000元钱助其逃跑。杨父和村长均以包庇罪获刑。

杨通登上哈尔滨开往南方的火车，随机在“周口站”下车。被捕后，他对警方称自己捡到一个身份证并用这个身份到周口市太康县一家酒店打工，2008年，杨通又以该身份盗窃入狱两年。

刑满释放时，他几乎是另一个人了。他从此不再乘坐火车、飞机、公共汽车，也不敢注册互联网账号。在某种意义上，他消失了。

用中文搜索引擎查找，能看到网友针对该案的讨论。有人将杨通列为“十大在逃通缉犯”，排名第三，还推测他为何要在身上文一朵红色玫瑰花。

冒名者

2020年10月29日，刘志刚再次见到了那朵花。它出现在河南一名男子的臂膀上，姿容与14年前警方获得的照片一模一样。

大庆市公安局追逃刑警将杨通（左三）由河南押解回黑龙江途中。

受访者供图

12月4日，肇源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负责人孙彦辉来到第一个司机被害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至此，公安部A级通缉犯杨通终于落网。

今年9月，第五个追捕杨通的专案组成立了。他们准备了冬衣，要去河南打持久战。

2010年，冒用他人身份的杨通出狱，现任肇源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负责人孙彦辉排查他当年的狱友，将杨通最后出现的地点缩小到漯河市的姬崔社区，时间也锁定在2013年。

不久前，站在姬崔社区街头，10个刑警感觉自己像“10只蚂蚁”：这里有两个批发市场，流动人口很多，杨通出现的2010-2013年，这里还有一个容纳3万员工的编织袋厂，已经倒闭，工人流散各地。“想从中找一个7年前甚至10年前的‘假人’”，罗红卫说，挨个排查难度极大，他决定先从花卉市场入手。多年追逃，他们碰到了“一点小小的运气”——一对老夫妇看到杨通的照片时说：“这不是小东北吗？”

据称，“小东北”早已经不送花了，改做假山生意，还自己开了店，罗红卫一行很快找到了老夫妇提供的店址。

为避免东北口音暴露，韩彦春在一名河南当地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进入店内打探情况。河南民警与前台女子交谈，韩彦春则往后院走，发现有一长发男子盖着被子躺在院内一帐篷中。

只看了一眼，韩彦春就认定了，眉毛、眼睛错不了，这个人就是杨通。

被摁住时，杨通仍然否认自己的身份。直到赶来支援的刑警扯下他肩上的衣服、看到那朵红色玫瑰花，他才承认。

在执法记录仪录下的现场视频中，为确保无误，警察问杨通父母、妹妹的名字，他答得一字不差。

缺失的第六个人，终于找到了。

杨通被抓的消息公布后，刘志刚、罗红卫、韩彦春等人“微信朋友圈疯了”，有人收获了上百个点赞，“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一些退休民警专门打电话询问他们如何抓到杨通。

今年11月初，专案组民警押解杨通回到他们的家乡。

在路过二井子镇时，杨通突然说，“领导，要不拐个弯让我回家看看，看看我父母，我这么多年没见过他们了”。

再次回到第一起杀人案的现场，当年震惊黑龙江、吉林两省的杨通，已不再是那个22岁的青年，他蓄起了长发，身体发福，眼神迷离躲闪——当看到一位警察双手插进兜里，他立即“蹲灰儿”，瘫在地上。

“咋地了杨通？”带队指认现场的肇源县公安局副局长余涛问。

“我以为你们要枪毙我。”他看警察拿出的是手机，不是警枪，才直起身来。

在2006年王东成等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上，受害人不再是新闻里的“出租车司机”，在他们名字的后面，亲属姓名一栏中显示：两个61岁的哈尔滨老人失去了儿子；两个年过七旬的青岗县老人也失去了儿子；一个44岁的肇州县男人失去了妻子，以及他刚成年的儿子失去了母亲；两个年过八旬的海伦市老人失去了儿子，他们12岁的孙子失去了父亲；两个36岁、37岁的大庆女人，两个29岁的吉林女人，一个35岁的海伦女人都失去了各自的丈夫；一个11岁的大庆女孩失去了父亲。

一审后，江铭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被害人家属坚持上诉，不惜放弃民事赔偿，只求严惩。最终，江铭被判处无期徒刑。诉讼初期，被害人家属还打电话互相慰问，后来，他们不再联系，因为许多家庭付不起电话费了。

最终到案时，杨通已结婚10年，育有一儿一女。妻子36岁，对丈夫的过往毫不知情。而在2000多公里外，何巧莲看到了杨通被捕的新闻，眼泪涌出来。丈夫身中56刀而亡时，她也是36岁。

她和刘仲春的女儿18岁了，早就忘记父亲的样子，甚至想不起自己叫过爸爸。而杨通离开漯河时，刑警们打开窗户，让他见家人一面。他2岁和4岁的孩子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站在街边，朝车窗里的父亲挥手：“爸爸，再见。”

（上接5版）

莫丽的微信头像是她生病前的样子，扎着马尾，眼睛大而明亮，对着镜头笑。她33岁时，疾病找上了她，将她的希望、活力、健康一并打碎了。

一次感冒，她去医院检查，查出尿毒症，“尿毒症是电视里的东西，我怎么会得？”肾病常常不易发觉，医生告诉她，“你这个病就像一个车子没有刹车，用钢丝绳索在拉。”

她告诉丈夫，医不好也不要告诉她。心里却想，“腌制的肉怎么把它弄成新鲜的嘛”。

那一年生日，她请了一条街的人来吃酒，在街边摆了10桌，杀了两头羊，买了几十斤鱼，大家都祝她身体健康。

到2018年，莫丽已经到了需要透析的地步，造瘘手术已做好，突然接到肾移植通知，“我当时心砰砰跳，怀疑是不是骗子”。

第二天一早，一家人到医院，莫丽第一次见到“哥哥”陈景钟。“他皮肤很好，看不出是病人，我还问他们一家三口哪个做手术。”陈景钟说自己已经透析一年多了。

需要签手术风险知情书时，莫丽又紧张了，开始犹豫。陈景钟则积极得多，他每次透析要4个小时，第二天就没力气了，第三天又要透析，吃够了苦。

移植手术当天，莫丽还没起床，陈景钟就给她去了电话，“怎么还没到，医生喊我们签字了”。她记得那天家人都来了，“我不敢看我妈，我妈也不敢看我，只要喊一声，眼泪就要掉下来”。她被推走时，头也没敢回，一路上看到房顶到处是钢管，转来转去，终于到了一扇不锈钢门前，她进去了，医生开始说话，她才平静了些。

手术做了4个小时，她听到有人喊她起来，“手术很成功”。50多岁的陈景钟在另一间手术室也完成了手术。莫丽移植了菲利普的左肾，陈景钟换上了菲利普的右肾。

做完手术回到病房，那天风很大，吹得窗帘响，“还好有他陪着我”，刚做完手术的莫丽想。

陈景钟对她说过，“我们现在是亲兄妹，我一定要到你家里去玩的。”

两家相隔四五个小时车程，莫丽去了陈景钟家里一次，陈景钟来到她家两次。每到一个地方耍，陈景钟就给她寄来特产，有些水果知道寄来要坏，还是要寄。

出院的时候，他们跟医生护士合了影，一起乘电梯下楼，不知道是缺氧还是饿了，莫丽忽然有点站不住，她丈夫两只手拎着东西腾不出手抱妻子，陈景钟的妻子马上替他接了过来。

后来，两个人复查也约在一起。“我们这个关系怎么淡嘛，有共同的话题，淡不了。”

2019年1月，陈景钟肺部感染住院，莫丽身体也出现了状况，她对他说“你不珍惜身体，我也跟着病了”。别人说他们是双胞胎，有感应。莫丽跟陈景钟的外甥开玩笑，“我跟你舅，比你妈都亲，因为我们流着同一个人的血。”

做完手术，莫丽穿上高跟鞋和连衣裙，又走在老街上。当别人投来眼光，她知道那种眼光跟自己做手术前是一样的，“但在我心里感觉不一样”。

莫丽和家人在电视上看过菲利普的故事，9岁的外甥喊“菲利普是哪个嘛”，莫丽说“他的病治不好，决定做点好事，他把肾捐给我，所以我们就认识了”。小男孩思考了一会，转着眼珠，认真地问：“真的哇？”

双生树

2018年5月7日，重庆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米智慧接到菲利普的案例。在红十字会、西南大学、医院和澳大利亚领事馆的见证下，菲利普的父母签署了捐献文书。

第二年的清明节，米智慧再次见到彼得，“（他）起码瘦了10斤，满脸胡子，完全变了样”。他拿着菲利普的小相机，不停翻看，不住流泪。他的两只胳膊、胸前、背上都有大面积的文身，有菲利普出生和逝世的时间，有他的中文名，有他的肖像，有他的吉他。“无论我去哪，他都跟着我。”

他还提到了菲利普对音乐的热爱。重庆市红十字会有意请来5位受捐者，组建一支临时乐队，为纪念菲利普而演出。不过，受捐者忙着不同的营生，也未必有音乐基础。

谭道必的儿子陈忠来当时正在游泳，接到米智慧的电话，“说我妈妈的眼睛是谁给捐的，是一个外国人，很热爱音乐，想为他建一个乐队。”他当即应下，那时才知道，“菲利普捐献（帮助）了这么多人”。陈显均也接到了那个电话，“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挂了电话，他又打过去确认了一遍才放心，“他也喜欢音乐”。

5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机场，“都不陌生的感觉”，莫丽说。他们先问候身体，又聊到孩子和生活。陈景钟的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陈显均说“接媳妇的话我们都来热闹一下”。

录音棚里，陈显均穿上了皮衣，他和伍军弹奏从没摸过的吉他；陈景钟反戴棒球帽，拿着手铃；莫丽把头发烫成波浪，她和谭道必负责沙锤。所有的服装上都印着一个标志，它由菲利普的名字和一把吉他组成，不同的是，五个人的衣服，在不同位置画了不同器官的轮廓。

乐队取名叫“一个人的乐队”。

“只在KTV唱过歌，对词不懂，谱也不懂，把录音棚老师急得，好搞笑，汗水都急出来了。”莫丽说。

谭道必不会唱歌，歌词只记得一些，回家后，她让孩子帮忙在手机里下载歌曲，反复听，直到后来“点不出来了”。正式演出的时候，工作人员站在台下对她晃着亮光的手机，告诉她什么时间停、什么时间摇、什么时间张嘴。

他们参加过一些演出。演唱的一首歌叫《感受生命》，舞台上出现菲利普的虚拟影像，表演看起来像是6个人完成的。完全没有英文基础的5个人还唱了英文歌《You Are My Sunshine（你是我的阳光）》，靠汉语谐音记词。

菲利普的父母在悉尼看过演出直播。5个人也看到，他们家里摆满了菲利普的照片，因为听不懂英文，他们并不知道彼得说了什么。几周后，陈显均等在电视旁看演出，“看他爸妈到底说的什么”，节目配上了字幕。莫丽一遍一遍看着回放，大声念出翻译。

米智慧很少见到“这么阳光的受体”，许多人接受了器官，但不愿张扬。她是重庆市第一位参与器官捐献的专职协调员，已经做了9年，参与了近500例。

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说得直接点，人家都要走了，你还把‘零件’取走，在中国很忌讳。”起初，她接触20例，只能做成1例。4年前，12例中能成功1例。

她总结出一些经验：出事的前两天不要去找家属，3天之后，家人会被拖得疲惫，进重症监护室一天动辄上万元，很多家庭支撑不了。他们下乡做推广，在每个有呼吸机的重症监护室外留下电话。

“我跟家属说，器官捐献跟正常人生病做手术一样，一个切口，之后会恢复遗容。能救活一个人，就是救活一个家庭，像他还活着一样。”

“捐献眼角膜，你看那些盲孩多可怜，对捐献者来说只是一层薄薄的角膜，一点影响都没有，但受捐助的人能带着你亲人看他没看见过的世界。”

“器官这么珍贵的东西，比黄金还珍贵，对要走的人来说，烧了是一把灰，埋了是一把土，人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上天给你做好事的机会，有人想做都没有这个缘分。”

很多时候劝说是有效的，但家属也会临时反悔。一次，受捐者已经得到通知，供体在推往手术室，家属突然叫停：“我昨晚接了一晚上电话，要是捐了，七大姑八大姨每人一口唾沫都把我淹死。”

米智慧有时需要去村里参加葬礼，代表机构发言：“捐献者是好人，捐献是无偿的，救活了多少人，你们村是好人村，他在天上看着你们，保佑你们平平安安。”这样，能减轻捐献者家属的压力。

重庆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周学跃说，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捐献，在当地志愿登记的人里，30岁以下占65%，30-45岁占24%。实际捐献者中，大部分是意外死亡的，外卖员出车祸和年轻人突发脑血管疾病致死的情形越来越多。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发展10年里，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了251万人，完成捐献的有3万多人，他们捐献的器官挽救了9万个生命。“但每年有3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大部分在等待中去世。”周学跃说，供需悬殊。

“一个人的乐队”第一次演出后，回到重庆，5个人提出要到菲利普的“墓地”看看，所有人都憋着眼泪。

彼得很想要一件乐队的演出服，而且虽然知道语言和距离是障碍，很想面对面拥抱5个人。他对记者说：“当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菲利普，这五位是家人的一部分。”

“明年5月，就是菲利普离开3周年了，我们仍然不能走出伤痛。”彼得流着眼泪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他家门前种着3棵树，象征着3个孩子，属于菲利普的那一棵仍然茁壮生长。他们为纪念菲利普又种下一棵，“我们用眼泪浇灌它”。

菲利普的骨灰一部分放在家中，十字架下，竖着“P.A汉考克之灵位”的木牌，旁边放着彼得买的小房子，房子的门始终敞开。另一部分骨灰埋在悉尼城边最悠久的墓地，周围有瀑布和棕榈树，墓碑上写着“He lived his short life to the fullest（他把短暂的生命活得淋漓尽致）”。

在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人们为这位澳大利亚公民立了一块纪念石，上面嵌着他和大熊猫的合影，旁边还立了一把金属吉他。“他的生命在5位中国人的身上得到了延续。”石刻铭文上说。

那里有同样的宁静，绿草茵茵，一棵大树静默伫立，那是一棵大叶榕和银杏的合体。纪念园工作人员说，银杏即将枯萎之际，大叶榕环绕它长出，银杏于是延续了生命。

（田文生对本文亦有贡献）